

太平天国时期林俊所领导的
福建农民起义

选自《福建师院学报》56年一期

1979年复制于北京图书馆

釋君尹

君与尹二字古通，“左氏春秋”隱元年傳：“君氏卒”“公殺”二傳并作“尹氏卒”；又昭二十年傳“某君尚”，“釋文”云：“君或作尹”，皆其例証。“逸周書”謂：周公君天下，即“左氏春秋”宣四年傳：“周公爲大宰相王室，以尹天下耳”。“儀禮”“喪服傳”：“君至尊也”，“注云”：“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”，又“禮記”“昏義疏”謂：天子諸侯皆称君，是古之治天下者謂之君，握治天下之权者亦謂之君。如君陳、君夷、君牙皆以人臣称君，是君之称非尽屬諸帝王。甲骨文君作𠂔、𠂔，尹作𠂔。“殷虛書契后編”卷下、頁二十九、第十一片言“多𠂔”，即同書卷下、頁二十七、第十三片之“多君”。“說文”云：“君，尊也，从尹口，口以發号”。段玉裁云：“尹，治也”。案尹从又持杖，以法度牧民也，故尹爲官名。从口象發号令，其說甚是。“說文”舉君之古文作𠂔，并云：“象君坐形”則非是。金文作𠂔、𠂔、𠂔，“正始石經”作𠂔，其演變之迹，蓋自卜辭至金文皆从口，至“石經”則變口爲𠂔，然所示者仍爲口。所以之𠂔，金文作𠂔，仍存以手持杖之誼；其作𠂔，乃曲直杖与手相合。后誤𠂔爲𠂔，象兩手左右并拱之狀，乃誤分作𠂔。許氏不知此誼，望文生訓，实難通。王國維“魏晉石經考”謂：周由𠂔而變，其說至確；但未窮其源，因为之補正。

太平天國革命時期林俊所領導的 福建農民起義

朱維幹

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以後，中國封建社會舊有的矛盾更趨於尖銳化，而且增加了新的矛盾，就是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；太平天國革命，就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之下爆發的。當太平軍攻下南京，進行北伐西征的時期，各省區人民，各少數民族紛紛響應，形成了全國性農民起義的高潮；福建在這個時期，也有林俊所領導的農民起義。這支起義軍，在清方反動軍隊和漢族地主武裝聯合包圍之下，象當時的其他起義軍一樣，由於農民階級本身存在着許多缺點，悲慘地失敗了；然而在客觀上成為太平天國革命的同盟軍，在五六年的艱難奮鬥中，也予封建統治者以沉重的打擊。列寧告訴我們：“必須不从個別的事實來看，應該就與該問題有關的事實之全部總和，一點沒有例外地來看”。在當前史學界研究太平天國歷史逐步深入的過程中，對於林俊所領導的福建農民起義，我們應該予以應有的估價。再從歷史教學結合鄉土教材的原則來說，這一問題，似乎亦值得福建教師們的注意。所以作者就把初步搜集的資料和一些淺薄的看法，提供出來，希望得到史學工作者的討論和指正。

一、林俊起義時福建人民生活的痛苦

關於當時中國社會新舊各種矛盾的情況，在所有太平天國史研究著作中，談得很多。在這裡只論列一些當時福建的具體情況。

(一)清政府統治下生產力的破壞 首先要談到海禁。福建人民在封建主義的經常剝削壓迫之外，又添了一種災難。按照清初截界令的規定，福建人民不得在濱海一帶居住。本省自閩安鎮起，北抵沙埕六百七十里；南抵分水關，一千一百五十里；福、興、泉、漳四府，福寧一州，所屬一十九縣，劃為界外的田地，多至二萬五千九百零四頃。瘠腴棄為荒地，廬舍淹為廢墟。無數人民，流離顛沛。經過了二十余年，才許復界。人民回鄉之後，一貧如洗。有些水利工程，例如莆田程口利海堤，于截界期中倒塌，隣內千余畝田，變為海蕩，^[1]一直到清末不能恢復原狀。沿海一帶，象程口的事例，謬必不少。福建的可耕地，本來不多；水利工程受了破壞以後，不加修理，糧食問題怎麼不

[1] 輒據莆田縣志卷二輿地(海闊)

會更加嚴重，再就漁業來說，也受了戒界令的極厲害的摧殘。據明季北略，當時的莆田和福清都有巨大的漁船遠航到韭山，普陀海面。據董應舉的崇相集，“魚自北而南，冬則先至鳳尾，臘月漸直外洋；故福興泉三郡沿海漁船，無慮數千艘，悉从外洋逆而北，至春，魚乃漸南，閩船亦漸歸釣。”復界以後，大的漁船造不起來；小的漁船不敢遠航；後一輩對於北行的航線，也就茫無所知。所以從那個時候起，福興泉三郡，除惠安帆尾村外，那裡還有遠航的漁船？^[1]道成年間，吏治之壞，見于各種記載的，我不必多舉；在這裡只指出二個例子，來說明福建官吏的破壞農村生產。謝章鋌（長樂人）的賭棋山莊詞話，有一段紀載：“歲壬子十月，余行泉州，見道旁薪者皆焦燬無枝葉，始知前日劇盜方出掠，官不敢問，盜去，官乃索賄于鄉，民破家不能滿官欲，官遂縱兵焚十余鄉，衆悉越入海，此其蠶余之物地”。^[2]謝氏所謂壬子，就是林俊起義的前一年（一八五二）。這是直接破壞福建農業生產的事實。

閩南各處常有械斗，由於官吏的幸災樂禍，借械斗以自肥，恰如張潔亮（建寧人）所詠的：“官貪民乃斗，民斗官乃喜”。^[3]命案發生，下鄉辦案，就乘機敲詐；敲詐不遂，就嗾使如狼如虎的兵役，任意焚燒掠掠，其生事害人者反得況身事外。被害者的親屬，若不願懲處，惟有自行報復。報復不已，械斗日烈；其初是村與村斗，其後擴大為聯鄉作戰；莆仙一帶因而有烏白旗的組織。結果是“村村殘破，戶戶顙連”。^[4]這是間接破壞福建農業生產的事實。

元明以後，南洋成為漳泉人民的第二故鄉，本省手工業成品，亦出口到海外去。復界以後，清政府還是執行閉關主義，成為本省工商業發展的桎梏。人民出國，有種種束縛；甚至隔海的台灣，亦限制人民前往；對出口的船隻只數，大小及船上人數，施以种种限制，這樣使得人民在國內遭受日益加深的剝削；這樣使得閩南的紡織，造船，航運諸業停滯不能前進；這樣做法，客觀上又為着資本主義國家創造控制海上交通，奪取遠東市場的有利條件。

（二）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侵略的影響 初期的中外貿易，於中國有利，道光以前，呂宋船來，每次以番銀十四五萬元，換收布匹，磁器，桂芝等物。^[5]從道光三四年起，才有鴉片入口。煙毒不久就彌漫閩南。從前士民家庭，一年有百金或數十金（指銀兩）收入，仍可維持。吸煙成癖，極小者每天吸二三分，就要花幾十文（銅錢），極大者每天吸二三錢，就要花几百甚至一千多文。吸煙的錢，比購買薪水的，多了數倍，結果就有巨量漏卮，使福建金盡銀空。^[6]

[1] 計六年：明季北略卷五，浙江巡撫張廷璽請申海禁疏及董應舉崇相集護淮水議

[2] 謝章鋌：賭棋山莊詞話五及崇道頭說

[3] 張潔亮：思伯子集，送史梅叔若闋七古詩

[4] 宋潔存：折耕集卷十，致泉漳治法論，（折耕集尚未印行，原稿存在宋潔存的子女手中）

[5] 道光廈門通志卷三番船案

[6] 同上卷十五俗尚

鴉片戰爭結束後，按照南京條約規定，福州和廈門，都開為通商口岸；洋貨就象流水一般從這新缺口沖入，廈門開為商埠，不到兩年，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的敬敷就向清廷報告：以前閩南人民，有自己的船，載閩南土布，銷售于寧波，乍浦，上海，錦州，蓋平及台灣各地，又把江浙棉布等項，从寧波等處帶回；洋貨雖有入口，也是閩粵商船自運。現在呢，英國貨都是由英國船載來，在廈就可以采購。內地人民，買洋布洋棉者，十室而九。江浙棉布，在閩南不能暢銷；閩南土布，也壅滯不能出口。^[1] 郭嵩焘在奏疏中曾屢次提到，在五口通商後，福建海關收入增加，而廣州海關收入，逐漸減少。^[2] 這說明了資本主義勢力對福建侵入的激進。

台灣的情形也是這樣。泉州土布，福州綠布，寧波紫花布，一向在台灣暢銷。噶瑪蘭（台北新墾地）的米，以前近銷漳泉，遠銷南澳，每年約有八九十万石。廈門開埠，未及三年，土布就失去了台灣的市場；^[3] 廉價的洋米亦向中國傾銷，每石台米，跌價到六錢銀子，還是找不到銷路。^[4]

鴉片戰爭以前，廈門船舶很多；東渡台灣，南往廣東，北向寧波，上海，天津，錦州，一年之中，往返數次；還有出洋的船，開往呂宋，蘇祿，實力（即新嘉坡）噶刺巴（今雅加達）各地，冬出夏歸，一年往返一次。^[5] 以航行于台廈間的船舶論，大的載六七千石，小的載二三千石，造一只巨船，要白銀几萬兩。舵工人等，以船為生，數以萬計。造船事業為廈門的經濟命脈所系；土木，五金各色工人，多由外地遷來，落籍的不可勝數。^[6] 因為外貿入口，一年多過一年，閩南海舶，漸無淘汰。同治五年（一八六六），左宗棠的奏折中提到：“漳泉卑化，地皆瀕海，居民以海為田。除渔船外，多置商船為通商之計。自番船西行，受載多而行駛速，內地船商之利，遂致侵奪無遺。昔之海坊有船數十者，近則只存數隻”。^[7]

鴉片和洋貨的源源入口，以及番船在中國港口的自由出入，使福建的白銀漏卮，農業，手工業和航運業遭受着嚴重的摧殘，以致福建有更多的失業和貧困者。本省田賦（清代叫做地丁）折征白銀。道光初年（十九世紀初）銀每兩折征制錢一千一二百文。由於白銀漏卮不已，銀價日增，官吏便以此為借口，任意提高田賦的折率；以至泉州各色人民，須納錢三千數百文，才可以完地丁一兩，這無異于加賦三倍。每一銀元（民間叫做番錢），重七錢二分以上，又止作為八百文計算；所以要完地丁一兩，便非有重番（指足重的番錢）四元不可了，這又是一種加賦。此外串票即完糧收據，每張收

[1]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藏軍機處檔卷（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年三期轉載），

[2] 郭嵩焘：奏知詩集卷之三

[3] 連橫：台灣通史四——頁，

[4] 徐宗幹：斯未信寶文編官贍卷六，

[5] 道光廈門志卷十五俗尚，

[6] 同上志卷六專述及十五俗尚，

[7] 左宗棠：左文襄公集卷十七，恭報回省日期及沿途察看情形摺，

四十八文，糧普又不肯照完糧總額制發總收据，而要折散為若干張。象這樣地重重勒索，还是清方編遣巡撫王從德自己說出的，咸丰三年冬，（一八五三年）他到了泉州，為了要和緩農民的反清情緒，而有核減田賦折率的告示。然而經過核減以后，晉江田賦每兩的折率，还是高到二千六百文。

^[1]田賦愈重，官僚地主擁田愈多，規避愈甚；同時又因為洋貨的傾銷和煙毒的泛濫，官僚地主的消費亦增加起來，結果都不免轉嫁于人民身上。这就是說，封建主義和广大人民的矛盾，又因為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，而更加尖銳化了。地瘠民貧的福建，居然變成為多種矛盾的焦點；即使太平天國革命不在廣西爆發，被压迫的福建民衆，早晚会也起來，進行武裝的反抗呵。

二、林俊起義前福建天地會的活動

清朝統一了中國以後，漢族人民並沒有完全屈服；中國南部有天地會的祕密組織，以反清復明為宗旨；三合三點，是它的別名；匕首，小刀，紅錢，黑錢之類，是它的分派。

關於天地會的起源與發展，不是本文論述的範圍，我只想簡單地說几句。一則明清之際，福建人民抗清最久，受害極深，所以排滿的情緒亦最為激烈，福建可能是天地會的起源地。二則天地會有前后各五房，分地發展；而插旗者所謂“福建烏龍第一枝”，豈不是承認福建房的宗子地位？明清之際，福建有不少人不願做亡國奴，而寧可漂海不歸；所以天地會的種子，轉向南洋傳播；但是到了道光末葉，反有人从南洋回來，在漳廈設立支會，進行組織宣傳的活動。咸丰元年（一八五一），監察御史晉江人陳慶鑄請辦閩省會匪疏，曾有詳細的敘述：

竊惟福建漳州府屬龍溪、海澄等縣民人，多往苏祿、息力、呂宋貿易；每就彼國娶妻生子，長或繫回，其人俗謂之“土生子”。向在外洋敲錢聚會成風。乃挾其故習，沿至漳州各屬，以至廈門，結為小刀會，亦曰天地會。凡入會者，需錢六百九十文，名“根基錢”。交完，即給八卦印一顆，紅白布各二方為證；內有小印，有口牙。其咬頭各制小旗一面，誓盟歃血。初不過取洋之所謂土生子者偶為之。積而漸引漸多，散布謠言，遂敢滿貼狂詞，（幹注：即反清文告），城鄉皆是。前經署廈門參將陳榮隆緝獲，稍為斂迹。乃捉獲后，地方官僅從輕問，略不懲办。

近有廈門人陳啓，素以傀儡唱戲為業，逃匿龍溪縣石美鄉南門黃尤家，與同安縣屬白礁鄉王泉倡造謠言惑衆，謂伊有神術，自可通天，能入會者免罪，于是石美、海滄、白礁各鄉附洋者，咸受其煽惑。兼以勾結广东土匪，訛言日至；遂顯然設斂錢之局，名為開香，一開便有數百人从之。而龍溪、海澄、同安各縣，皆明知其事，而不敢過問。以故該匪肆橫罔忌，且謂入會則上至省城，下至广东，皆有資糧相助，免至乏食。不數日間，入會者已近數萬人。其“賊

^[1] 沈 錄：舌擊錄，咸豐五年九月某日真及南安縣境內鄉近代革命史料錄本，

股”則有同安縣屬之白礁鄉王小，長園鄉劉四，山邊鄉李景，李景瀋；龍溪縣屬之南門黃尤，田里鄉王靖；海澄縣屬之新垵鄉邱姓，坂尾鄉林姓，皆奉陳鴻，王泉爲大頭目；千百成羣，強派各處殷戶，截掠各處賈夫，或入會，或助糧；从者平安無事，不从者災禍立至。其有大姓強宗殷戶，未易嚇索者，該匪聲言于起事時，即先問罪。故始而從黠者爲之，今而謹願者亦從之；始而無賴者爲之，今而殷富者亦從之。結連數百鄉，莫敢誰何。

上年（道光三十年）十一月間，該賊目王靖，李景，黃尤，劉四各擁衆入會；明知文武官有意隱容，遂白日豎旗，聯絡聲勢，張貼狂悖字樣，遠近駭聞，廈門爲之震動。其龍溪縣告示，皆被匪徒用黃紙貼蓋，別書字號（幹注：這是指天地會用天德年号），狂狠已極，而知縣佯爲不知。嗣署廈門參將陳勝元同同安縣圓他本，扎諭該縣之鳳山，文廟兩書院紳士勸諭，亦莫誰何。迨升任興泉永道張熙宇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到廈，立飭署縣圓他本往賊屯之積善里查办，而該縣會營弁未到其地；僅到附近之灌口鄉鳳山廟，喚出安仁里之蘇陳楊林各姓紳耆出結，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回報地方安靖。十二月初一日，有文廟書院紳士公同來廈，面稟道廳嚴出告示，一面移咨陸路提督及汀漳龍道訂期勦办。然賊勢自龍溪，海澄，同安漸至長泰，南靖，蔓延已四五縣，現已分遣奸細，招誘泉州各縣鄉民，即台灣亦聞頗有搖動。若不急加痛勦，其害伊于胡底？^[1]

陳慶鏞說出天地會的支派小刀会在福建下游的發展情況。陳鴻爲什么能在數天之內，吸收數萬會員？閩南不曉得有多少農民，職工，水手，無衣無食；華僑出國困難，在國外屢受居留地殖民政府的逼迫或屠殺，清廷所以不提出抗議，实出于心里暗表贊成；還有赤案的焚燒劫掠，使閩南有無數人民無家可歸；在平時都是敢怒而不敢言；陳鴻能說出他們心里所欲言的話，人民怎么不会同意？所以小刀会就能迅速發展，奠定了閩南農民起義的基礎。

再就閩北山區論，天地會也有潛伏的力量。陳慶鏞在咸丰三年七月十六日“條陳閩省賊匪情況疏”上說道：

其上游一帶，“賊匪”大都起于邵武，建陽，順昌，崇安，將樂，沙縣之間，而屯于九龍山。傳聞“賊”首姓洪，有三點號；其暗號則舉手不離三，開口不離“俺”。已有三十年余年。后改爲紅黑扣；其青衣用紅扣，其白衣用烏扣。又改爲紅錢會；用康熙年間錢式，將字上刀刻三畫，朱其中。每會則云“往朱家吃了沙去”。其暗號則以髮綫爲記：凡上午則綁左上右落，凡下午則綁右上左落。約計此“匪”不下五六千人。

其小會曰“燒紙”；每月一會，約數百人或千人，小頭目主之。每人出錢二百文，飲酒拜盟而散。

[1] 陳慶鏞：續經堂類稿卷二，

其大會曰“坐台”，每年一會，搭高台一座，用刀把門，大頭目主之。初入會者出錢一千，以鐵刺臂血于酒，飲之而去。

其爲官目督撫，曰都督，名目不一；鈦板令則打仗者也，草鞋令則報信者也，過江龍則大小爲勘照名字者也。

汀州復有江湖會，約數千人，其會則羔羊宰牛演戲如坐台。上年祭獲會首周用稍放逐。今著名有廖光如，充當縣役，仍在上杭峩市盤踞，科斂客稅。本年廣東“賊匪”竄擾上杭武平一帶，遂與延連各匪，相爲犄角。

其部武入會者，則與江西寧都婺源贛聚于長汀瑞金交界之黃竹嶺。查江西余匪（幹注：此系指太平軍而言）尚多，萬一勾連，尤成滋蔓。^[1]

如上所述，就是天地会在上游的活動情況。天地会在上游的分派，除紅錢江湖之外，實則還有黑錢一派，陳慶鏞沒有指出。近來史學界有人主張天地會不是農民的組織，而是包括“流民無產者”的城市平民組織。^[2]然而我們在這裡，看見了山區裏的祕密組織，已經歷有三十余年。理由是容易說出的：經濟落後的地方，封建勢力更為濃厚；人民所受的痛苦，更為慘重；何況在偏僻的山區，進行地下運動，更容易避開統治階級的耳目，所以上游也就有紅錢黑錢諸會的組織。這就是林俊起義的羣衆基礎。

三、一八五三年小刀會和林俊的同時起義

當太平軍發展到長江流域的時候，福建上下游已經有了許多農民自發的鬥爭，清方署閩浙總督王懿德自顧不暇，而還要出兵援湘援贛援江寧；^[3]省內兵力空虛，更大規模的起義，就在上下游同時爆發了。

漳廈沿海地帶的起義，由小刀會發動，領導人爲黃德美。而上游山區就是林俊所領導的起義。

據徐珂的“清稗類鈔”，道光二十九年，（一八四九），新嘉坡人陳正成到了廈門，設立三合會支部。正成爲清方所害，會務由黃位（類鈔作黃威，茲照民國時修同安縣志改正）主持。聚富黃某被官吏敲詐，黃位代抱不平，就率領二千余人起義。民國時修的同安縣志說，海澄有江源從外洋回來，和兄弟江發組織小刀會。同安籍人黃德美（同安志作黃得美，茲照王靖毅年譜改正）有田在龍溪崎芝洲，佃戶抗租，德美向龍溪稟告控告無效，就和族叔黃位加入海澄小刀會，想借會黨声勢來玉逼仙農。天地會的發展，招起海澄知縣的疑惑；他就把江家兄弟害掉。黃德美發了誓，要爲他

[1] 陳慶鏞：義經堂類稿卷三，

[2] 郭發生：新興市民等在太平天國革命中的作用（歷史研究，一九五六年三月）

[3] 王家勤編：王靖毅（懿志）年譜卷上

們報仇。^[1]兩種記載，基本上是相同的；都提到黃德美系地主豪富出身，這與後來他在革命中的表現，有很大的關係，下面還要說到。

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了。陳聲、王泉、陳正成和江家兄弟，已經為黃德美組織了許多民衆；所以革命起于海澄，只消一夜工夫（咸丰三年四月初六日）縣城便入于小刀會的掌握。革命勢如破竹，初十日占領龍溪，長泰，十二日占領同安、安溪、廈門，十三日占領漳浦及平和的琯溪，十四日占領銅山（今東山，當時屬詔安）。^[2]

革命武裝擴充得很快。據同安縣志說，黃德美入海澄時，人數僅有千余。據“清稗類鈔”說，黃位起事時，所部僅有二千余人；占了廈門附近市鎮，部隊就達到八千以上。以三十只篷船，載兵渡海，進攻廈門。清方的隊中有小刀會會員，為數不少。起義軍得了內應，就于三天之內，取得閩南的第一港口。^[3]貼了下列布告：

漢大明統兵大元帥黃為曉諭事：

父老苦清苛法久矣！貪官污吏，政皆流為虎之奇；竭財耗脂，民盡歎夫鼠之碩，以致山崩海溢，年凶歲飢；盜賊蜂起，黎庶魚潰。

我大明天德皇帝，休天行仁；奉旨征討，應天順人。官斯土者，陽民無惑舊，鼓吏有从軍；釋甲執冰，軍無斗志。蓋其本实先撥，其所出來舊矣。

爾提督（指清提督施得高）等貪生畏死，棄已抱頭鼠竄，饒爾一命。胆敢妄忻奸謀，收拾余燼，饒倖萬一，豈知清朝天心厭絕，莫可挽回；所以棄甲曳兵，舟中之指可掬也。独不思我師興而雨，一洗清朝如燬之焚；爾人民等何強不盡瑞應，仍敢懷試心。夫試心果有何益哉？今若此蜂發仍其肆虐，虎賁展我洪威；殆所謂天命，非人力也。

天德癸丑年四月二十六日給。^[4]

這篇文告，可與下面林俊的文告相比較。

當小刀會在閩南起義時，林俊也在戴云山下，擎起了轟轟烈烈的革命旗幟。

林俊的家鄉在永春霞陵。他的父親林捷云，中過武舉。他自己也是一名武生員，學名為林万青。他的義氣和勇敢，得到當地青年的信仰。太平天國的建立，江西各地的解放，消息傳來，激動了他的心情；他便和摯友陳湖，分頭接洽紅錢黑錢兩會；又以調停械斗為名，常向附郭鄉村宣傳民族思想；勸大家言歸于好，向祖國的仇敵作戰。^[5]林捷云聽到了這些風聲，怕惹起滅門巨禍，把兒

[1] 民國十七年修同安縣志卷三大事紀（小刀會紀錄）

[2] 陳衍：福建通志通紀卷七

[3] 陳慶鏞：續經堂類稿卷三條陳閩省賊匪情形

[4]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“太平天國”II 附天地會文書

[5] 民國時修永春縣志

子送官兩次。永春知州崔洲釋放他兩次。第一次勸他以父母為念，不要走入“歧途”。第二次是因為城里的天地會會員，已經有一千多人，一致表示，願與領袖同生同死，^{〔1〕} 崔洲不釋放也得釋放。

第二次釋放後，事勢不容再緩。林俊便在咸豐三年四月起義，攻入德化縣城；他的部下黃友（王端毅年譜作黃有使；茲照民國時修永春縣志改正）攻入永安，大田，江水攻入沙縣，造成了革命初期的順利。

永春縣志載林俊一到德化，清知縣申逢吉就拋棄城池。又載林俊最初因為永春是他的家鄉，有所顧慮而不敢迅速用兵；然而顧慮的結果，還不免於父親被害，廳幕被毀，親友被株連；於是林俊就迅速集中部隊，襲取了州城。

沙縣志載江水以四月二十日來攻，“時承平日久，民不知兵，城垣積久多壞，無可為守，邑令邵攀被執”。

福清紳士劉存仁的家書載江水入沙縣的情況說：“詢之來差云：二十日，永安沙縣相繼失守。該差正在沙縣，跟賊入城。……目擊該匪頭縛紅巾，約有數千，器械殘缺，全無隊伍，一鬧而集，并無殺掠細民并劫派紳富。自出錢粟，市廬交易如常，窮民从賊者不少。”^{〔2〕}

這樣看來，豈不是一支很有紀律的起義軍么？

沙永占領了以後，黃友又帶了几千人進攻延平，因為清方增援，才解圍而去。^{〔3〕}

革命一開始，就遭受了地主階級的破壞。

大田縣志載“余延黃友……以紅錢為號聚衆為亂，先入據桃源，旋遣邱師進攻縣城，邑生員陳某，監生范某……等為內應。二十一日（四月）匪數百入城。……賊授陳某等為僞官，遣范攻德化，范趨趣不敢前，賊將殺之。范懼遂反戈，鼓衆入城，賊未及備，死傷甚衆，黃友遁”。可見大田得而復失，是由于地主范某的倒戈。

沙縣志載“五月十三日為攝帝誕辰，居民方祝壽飲，一時感動不禁，奮勇持械，糾衆殺械，救出邵令，恍若有神助之者。此時賊皆驚慌，遁出城外，被斬者百余人。”這里所謂“感動不禁，奮勇持械”，自然是由于潛伏着的地主階級的陰謀，同時說明革命陣營的警惕性不足。

甚至林俊在永春也受到本地豪紳的敵視。他們組織了地主階級武裝，為清方出力，使林俊不得不離開永春，並且損失了一個哥哥（林倫）。

革命在上游的情況，大略如下：沙縣以四月末攻克，五月中失去，再攻不克；永安亦失去；尤溪于六月初八日攻克，十四日失去；大田從四月到六月，得三次，棄三次；永春德化亦不守；軍事

〔1〕 民國時修永春縣志

〔2〕 劉存仁：紀實錄文鈔卷四復曉農五弟書

〔3〕 民國時修南平縣志卷二大事志

在上游不甚順利，兵鋒就轉向仙遊。

由永赴仙，大路山白隔嶺經過，嶺上有清軍防守。仙遊的黑白旗人民，已經有了革命的覺悟，引導林俊，从小路繞過白隔嶺，咸丰三年八月二十四日，到了仙遊城下；一戰便取得縣城，殺了清方的知縣黃曾惠，貼出文告：

欽命統兵大元帥林萬青，
欽命統兵副元帥林元助，
統領三軍李增齡，
調署興明縣潘宗遠，
爲剴切曉諭，以安地方而肅民心事：

天道不能無盛衰，世運不能無升降，帝王不能無鼎革。惟順天而動，應運而興，相時而起，斯救民除暴，爲天下万世之仁人，即爲天下万世之元輔。我大明聖祖皇帝，奉若天命，定期中原，四海永清，万方入貢，天下頤太平焉。森朗肅夷，幸邀大明帝命，而作發夷之長；乃当中華鼎沸，假勤王之師，攘攘聖祖神器。勸善責科，淳淳賢人之經濟；養族資滿，消耗百姓之脂膏。英雄志士，莫不切齒痛心，思洗亂華之恨。

今日皇上，大明聖祖裔孫也。惟天錫以勇智，表正方邦，扫除滿奸，恢復王室。本帥欽承天子成命，義旗一舉，万衆歸心；戎馬南臨，羣黎稽首。自永春起義，而德化、大田、尤溪、仙遊、永福、一州五縣、不煩再舉之師；豈非天以我王克錫其德，用附于大明哉？

凡厥庶民，有濟世之奇才者，投誠而奉命，本帥即授以官師之位，任以良將之權；凡入營伍者，有功書賞；異日一休奏明，醜功勳以昭盛典。其余農工商賈，各安本職，自不使一卒一兵，擾爾樂業。倘有頑夫，敢領漢奴義勇，大兵一臨，即滅其身家；領首之家，立夷其三族。至所到州郡，貪官則除之，良吏則宥之；無非欲救生民于水火，以效忠悃于聖王也。

勸爾庶民，体本帥之苦心，共作新朝之臣子；勿昏迷不悟，以蹈我王之法網焉。慎之凜之，毋貽后悔。特示。

天德三年癸丑十月二十四日（幹注，十月當是八月傳抄的錯誤）

这种文告，自然不会停留在清代所修的方志里面。辛亥革命以后，各地新志乘，亦多爲前清遺老所修；所以这种文告，在新編的省縣各志里，还是找不出的。好在南安舊墟內鄉（農民革命據點之一）还有鈔本存在。福建師範學院有一位潘人和同學，是建內鄉人，代我抄到了這件珍貴的史料。

这篇文告，主要的口号，是反清復明，和黃德美的文告相類似，也和當時天地會的其他文告相類似；開頭所說天道盛衰，世運升降，帝王鼎革一段話，與一八五三年徐建杰在廣西所出文告，尤

為類似。^[1]然而對清政府的指斥，却只有剷除貪污，救生民于水火的兩句話，還不如其他文告的激烈。對於濟世奇才要“隆以賓師之位，任以良將之權”，顯得對知識分子特別重視；帶有濃厚的閩國時代帝王將相的思想；而對於農工商賈，却只有“各安本職”，“不使一卒一兵擾爾樂業”的表示，殊不足成為動員廣大勞動人民的政治綱領。然而在當時，福建農民革命條件，已經成熟；在天地會以長時間建立起來的羣衆基礎之上，這篇文告，也起了發動羣衆，擴充革命武裝的作用。

四、上下游起義後清方官吏的窮于應付

革命爆發以後，閩南民衆有了熱烈的反應。人民在從前是受盡剝削，現在是抗租抗稅，到處準備武裝抵抗。

沈儲是當時署理泉州知府馬小峯的幕客，在他所著“舌擊編”里說道：

“自匪擾以後，百姓凡不知完糧爲何事”。^[2]

“从同邑（同安）西南門起，至灌口龍江一帶，百余里間，大小數十鄉，民心無不變動。現竟按照丁口，派糾錢文，購办火礮器核”。^[3]

從前是畏懼官吏，現在是蔑視官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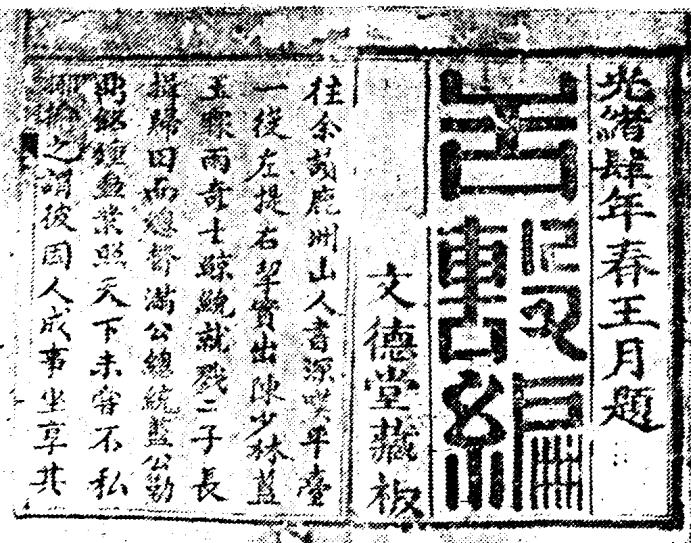
“署漳浦縣某令自同安回鄉，行至沙溪一帶，匪徒將行李搶去”。^[4]

從前是畏懼軍隊，現在蔑視軍隊。

“郡城（泉州）及同安一帶，驛路……游近匪徒，竟敢結伙

持械，公然剽搶；甚至官兵弁兵房号衣器械，無不洗掠”。^[5]

上下游同時起義，和人民的熱烈相反，使福建的清方官吏慚惶失措。加以台灣當時也有起義，



“舌擊編”光緒刊本 (福建師範學院蔣德基教授所藏)

作者沈儲，久官泉州，為清方官道同文體，得與閩機密，榮列此編，傳本已稀。

[1]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，「太平天国」IV，三民書局影印。

[2] 沈儲：舌擊編；光緒五年五月某日晉江縣署裏。

[3] 舌擊編卷五代李順伯（廷玉）函及代馬知府。

[4] 同上；光緒三年七月馬知府。

[5] 同上；光緒三年六月馬知府。

李石吉領了台灣縣，林恭佔領了鳳山縣，各處都要用兵力來鎮壓，使清方難以兼顧。當時福建除水師外，陸路兵額四萬有余，然而多數是挂名兵籍的；或以小販傭工為本業，有空的時候才應差操；或借當兵以蔭庇門戶，差操與他們全無關係。所以莆田宋際春才有“覘點兵”的詩：“羽書忽報前軍失，飛虎符趣救兵疾。鎮帥帳門坐點行，行人妻子哭盈室。行人告我一長吁，先帝之時吏道無。鷹鵠滿路擗人食，惟有將軍樹下遊無虞。百金新補黑衣隊，朝憂魚肉暮睢盱。終歲汎防挂空鏑，月終錢米無錙銖。即使感恩但有死，丈人試思，膏梁子弟能戰乎？”^[1]

詩里有“百金新補黑衣隊”的一句話；當一名兵為什麼要花許多錢？宋際春還有一段“偶筆”可以注這一首的詩。

“充什伍中，守兵月餉銀一兩，米三斗；騎兵月餉銀一兩四錢，米亦三斗；數年來，一兩銀可抵二千二三百錢；是一人為兵，其應得之銀米，足以自養，并贍一妻一子裕如也。乃充此郡驗之兵，當差者合銀米尚可望一千八百。若坐家之兵，盡銀米銷耗而不足。掘兵符者囊括之，司餉餉者匿漏之。假之名目，以減侵漁；朝廷億數万之帑金，未足墳無窮之帑壑。而兵不聞怨叛，人樂願為兵者，國家失刑，胥吏日罔法以苦民，民有担石儲，欲出戶庭而縮足；惟為兵則官府皆無如何，何論胥役？匪此必難，恣睢無忌；昔之為人暴者，今且得復暴于人；故謀一兵捐數十金，謀一騎兵祝捐一國學生費過之。彼其兵以財成，并不魚肉之幸矣，遑敢問銀及米乎？”^[2]

綜上所述，當時的兵，有蔭差當差兩種。蔭差是坐家的兵，大都是鄉村的富農，捐一名兵，以免受官吏魚肉；不到營，不與差操，實際上就是虛額。當差的兵，亦只是以余暇去應差操，沒有战斗力，和坐家的兵，几乎一樣。所以到了林俊起義的時候，統治階級的兵，常常變成了農民軍的輸送隊。謝章挺的苦兵行，說道：

“賊來兵似鼠，聞賊姓名不敢語。賊去兵如虎，拔劍民間亂殺舞。今日急行二十里，明日緩行，得半即止；急行先賊驅良民，緩行為賊送行李”。^[3]

正規軍不可依靠，統治階級又另招鄉勇；鄉勇的收效如何，在福州郭柏蔭詩中也有了說明：

“土賊至，官兵回；土賊去，官兵來，官兵來回民罹災。民罹兵災猶自可，鄉勇害民甚水火。詔安勇，短衣裸；興化勇，挾包裹；廣東勇，護黨伙；白晝橫行街市間，官司不能奈何我”！^[4]

兵不能戰，所以小刀會取得廈門以後三個月，清方動員了一万余人，開支了十万余兩，也只能坐守同安，不能前進。雖然清巡撫王懿德以八月十三日親到泉州督戰，但前方將弁還是常常以糧餉不墮為借口，徘徊覲望。

[1] 宋際春：柘耕集卷四（鉛本）

[2] 宋際春：綠天偶筆（鉛本），

[3] 謝章挺：賭棋山莊詩卷七，

[4] 郭柏蔭：石泉集卷四、海上謠（募鄉勇），

六、當時福建的清方官吏，除了兵力空虛之外，財政方面也存在着極大的困難。例如七月分泉州庫存不及五千兩，八月分省方庫存不及二萬；而為了防禦小刀會已支出了十九萬。福建向北京要求撥款，北京令“各省浙蘇接濟”，几乎等於一句空話，福建官吏只得發官票、鑄大錢來救急。本來在農民起義以前，私鈔已發行無數，現在又有官票，結果都淪為無法兌現的紙幣。

薩大年詠銅錢缺的詩，說得很憤慨：

“何人奪我銅山去？國用从茲不充裕。民間將楮抵作錢，緩急何能資用度？舊年官局閉，謂可阜民財；民財入官局，席貨如塵埃。昔日將錢來換楮，今日交楮錢不與。可憐一斗粟，豈易登籃管？可憐一尺布，軋軋弄机杼。吾民膏血盡在茲，博得半紙值几許？”^[1]

潘發沙號，是官僚地主商人對人民的聯合剝削；結果是錢莊倒闭，引起福州市民的忿恨示威。五月十六日，羣衆搗毀了四家錢莊；第二天又搗毀了兩家。雖然示威者被統治階級殺害了六個，但是結果使官票和大錢都不能通行；^[2]清方的財政困難，仍然無法解決。這一切的形勢都有利於革命的向前發展。

五、小刀會起義在廈門的失敗

黃德美、林俊起義時，雖然氣象蓬蓬勃勃，使得統治階級首尾不能兼顧，但是起義軍方面，上下游各自為戰，沒有配合行動。下游方面，帶有更多的缺點，就首先暴露出來。下游小刀會的領導人是黃德美；他加入小刀會，是想借會黨聲勢，來壓迫佃農。後來看見江家兄弟被害，心慌自危，才勉強起而抗清。到了廈門，有一個資卜者洪某，勸他不必巷捐戶派；但把林李二姓家資沒收，就可以充一年軍餉。黃德美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，寧可向無數小市民勒索，而不願和當地的巨室鬥爭，甚至自己有財產數十萬元，也不供革命之用。洪甲勸他籌備水師向海上和遠方發展。^[3]從前鄭成功確是這樣做。假設黃德美一到廈門，就能利用當地所有的海船，水手和造船匠，亦何至受清方的封鎖，而至于進退無路？但是黃德美並沒有從遠大處着想，所以不會采納這些建議；到了反動軍隊逼近廈門的時候，小刀會又發生內部分裂。

陳堅鏞在“條陳閩省匪情疏”上說：“下游匪首，一為同安人黃姓，為旗書漢大明天德殿前統兵大元帥；一為廈門港仔口人洪姓，為旗書大明二公司”；兩方惡感甚深。還有英國人的通訊也說在廈門的首次兩頭目，為了一點微小的恩怨，而引起流血。^[4]這是革命的致命傷。

然而閩南所有的官僚地主，都集結在清方旗幟之下。小刀會所占領的城市，無不隨得諸失。漳

[1] 蓋影堂詩卷上，

[2] 起雲樓文鈔卷四復丘弟書，

[3] 陳衍：福建通志通紀清七

[4] 北京大學太平天國史料廈門事稿

州城失于四月十三日，只占領了兩天；同安失于十五日，只占領了三天；漳浦失于十七日，只領占了四天；銅山失于二十二日，只占領了八天。清方靠各處地主階級武裝以進攻各地農民革命。農民軍方面，也沒有很好保存實力，沒有動員更廣大的農民羣衆，以發展後方根據地，而拼命進行城市的爭奪戰。例如漳浦縣城雖被清方奪回，而據福州紳士郭柏蒼哭兄詩所說，還被農民軍圍困七個月。^[1]結果是逐漸消耗自己的力量，使廈門陷入被包圍的局面。

同安地主李廷鈺，以革職提督家居，王懿德奏請起用，指揮攻廈的軍隊。李廷鈺以同安巨姓而兼豪富，自募壯勇六百四十名，作為主力，渡海至廈門，經七十三天，歷四十八戰。^[2]廈門城乃于咸豐三年十月十一日復入清軍之手。據清方捷報，起義軍陣亡以及落海而死的以萬計。據英國人通訊，起義軍由閩南跑到海邊，進退無路，犧牲了一千二百余人。這是革命領導不得其人的結果。^[3]黃德美臨陣脫逃，到了烏嶼橋，（幹注：烏嶼橋有兩處：一在晉江的洛陽橋附近；一在同安龍溪交界，嵩嶼和石美城之間，南瀕九龍江口；這裡所謂烏嶼橋，當指後者而言），被黃姓紳士自行綑送清方，死得不光榮，只有黃位浮海得脫。小刀会在漳廈的失敗，使敵人得以集中力量，來對付林俊的餘伍了。

六、莆仙人民響應林俊起義與漢族地主武裝的頑強抵抗

林俊到了仙遊以後，兩次進攻莆田，清方所派的援莆將弁，海壇總兵鍾寶三只有親兵三百；提督炳文在驛舍里杜門不出，其兵力之單薄可知。

林俊由仙遊到華亭，力勸烏白旗取消前嫌，一致反對統治階級；和他們約定九月初八日，到霞皋集合。初九日攻城，約有四五千人。烏白旗人手持槍械，腰繩“叉口”（幹注：當系繩火藥的布袋），身披棉絮，每兩個人帶一架竹梯，想由莆田城的西南邊上去。清軍把“火藥罐”擰下，燒了南門外店舖。府縣壯勇，海壇援兵，陸續登城，搶奪了農民軍的竹梯。城中一部分市民，也來幫助反動軍隊，拋了無數磚石下去。林俊退回仙遊。有三百名農民軍，經過灘溪，被武舉人許捷南誘執，押到南門外，全數被殺。^[4]

在泉州的福建巡撫王懿德，以為有機可乘，趕緊派新任仙遊知縣黃祭凌和參將周兆麟，帶二千兵勇奪取仙遊，到了楓亭，遇見林廣（林俊族弟）的部隊，不能前進。

晉江紳士楊凌有一首“楓亭歌”，記載着當時楓亭人民對清方的痛恨：“楓亭老翁仰天歎，白髮不見刀兵亂；無端宣旨夏木繁，深叢恐匿狐兔竄。斧彼鋸彼片時空，方紅陳紫萬花斷。十年樹木兜成

[1] 郭柏蒼：三峯草堂詩卷上，哭伯兄新甫詩

[2] 陳衍：福建通志通紀清七引馬卷集

[3] 北京大學太平國史料廈門事詳

[4] 陳池養：慎餘齋尾文集癸丑守城記

林，（原文作村字）“成得林等簽下認。物猶如此人何堪，三十四摺今塗次”。^[1]这就是說，清方以戰略上的需要為理由，砍伐了無數果樹。黃潔虞在仙遊署過知縣兩次，在辦理械斗的時候，燒去了無數的民房；這次又是面目猙獰，向各總勒誦；而林俊一到仙遊，就把最騷擾人民的所有機關燬掉，正是明顯的對照。所以到了九月十七日，林俊向清都司陳光標部進攻，連仙遊縣勇也響應起來。陳光標幸得逃命，黃潔虞、周兆麟知縣丞李子讓，都被農民軍打死了。^[2]這是林俊到仙遊后的第二次勝利。

林俊再到舊亭，請烏白旗人物公議，又向他們進行一次調解。九月二十三四日，第二次攻前，比前次人數加一倍。林俊率領主力軍數千人，攻西北高地；烏白旗人民無數，攻西南一帶。^[3]

莆田有兩個極反動的官僚地主。一個為舉人張大原，住在東關外新度鄉，組織地主階級武裝，官方稱為“南洋義民”，（幹注：莆田平原，分為南洋與北洋兩部分）給發藍色綢旗，編列番号。旗作三角形；左上角寫着“府正堂欽，協鎮府琳”，右下角寫着“縣正堂賴，府經廳切”，和給某某鋪等字樣，中間大書“義民”兩字，每字各有一尺見方。（數年以前，南洋各鄉，還有保存此項旗幟的。）林俊圍城第三天，張大原派兒子尹仲率領地主武裝，到了附郭地方，城中出兵接應；農民軍前后受敵，才山西門外常泰山區退往仙遊。據宋祭春“綠天偶筆”所記，若無張大原的“南洋總兵”，莆田不能固守。張大原為什麼要與林俊為准？因為他欠了人民一筆血債。在此以前，烏白旗有一次合兵進攻新度，陣亡了二百多人。原因如何，可想而知，由於張大原勾結官廳，數與人民為難。在未入城以前，烏白旗暫且不談南洋問題。如果有入城機會，非向張大原算賬不可；所以張大原就抱着與莆田共存亡的態度，比清方守城的官吏，起着更大的反動作用。

還有一個陳池養，是城里人，做过几任知縣。民亂時陳衍修的福建通志為陳池養立傳，說：“莆田受困數晝夜，勢岌岌，池養自白紙城下，馳赴大原家，召鄉兵，一呼而集者數千人；分三之一迂迴潛伏，斷匪歸路；統率衆旅，來城救援，出不意，兩面夾攻，殺匪軍無數，生獲數十人，其餘分路走，城圍遂解”。這又說明了漢族地主階級的頑強抵抗。

林俊第二次攻前不克，清方又以為有机可乘。參將瑞文和通判其昌，想从葛溪到何嶺關的間道，以兩千兵勇暗襲仙遊。他們又和仙遊西鄉地主階級約好了，一到仙遊，便會有地主階級武裝一万人接應。十月二十九日，清軍到了凌波，離仙遊東門只有五里路，有烏白旗為裝的地主階級“鄉團”，引誘他們到了南門外的東屏山地方，伏兵四起，殺了瑞文、其昌和遊擊周尚襄，把首級獻給林俊。這是林俊到仙遊后的第三次勝利。这三个反動官員和一些陣亡士兵的墳墓，還留在東屏山山

[1] 楊凌：冠海堂詩鈔卷一

[2, 3] 憲餘書屋文集，癸正字城記及勦捕事宜議

就是今天省立仙遊中學附近。^[1]

仙遊傅廟等地主階級武裝，打死了烏白旗人好几百。^[2]

興賢里西苑村有一個捐職主事戴齊松，号召了九座山上下數十村的地主階級武裝，于十月十四夜集合，把駐在山上的童森部（林俊所轄的部隊）打死了三百余人。林俊受了重大的威脅，便于第二天退出仙遊。曾經第二次取得的德化縣城，也在這個時候被清方奪去。^[3]當時的全國形勢是一樣的，清政府的腐朽和兵力的薄弱，已經瀕于崩潰了，然而漢族地主武裝和外國資本主義的聯合力量，挽救了封建統治的危機；福建在左宗棠的湘軍未到以前，如果沒有當地地主階級的頑強抵抗，以當時清方在福建的兵力來論，是不能阻礙林俊起義的發展的。

七、林俊回到山區的繼續鬥爭

永春和德化交界，有一個要隘，地名虎豹關。林俊由仙遊到這裡休養兵力。清永定知縣吳翊昌，以地主階級武裝為響導，山間道而上，把寨房焚燬。林俊和童森移到帽頂，黃友亦由永安來會。帽頂在永春西邊的三都；懸崖峭壁上面，有一塊平地，又有豐富的泉水；寨門設在東南，山這里到寨頂，要走了好些迂回曲折的路；——這是一個很好的虛據地。林俊在這裡築寨積糧，分兵再攻德化縣城，清方靠着副榜陳湖的地主階級武裝，才把縣城守住。^[4]據王懿德年譜，陳湖在這次陣亡；據永春縣志，陳湖為內部人所害，使林俊不勝悲痛。

林俊到了帽頂以後，農民軍有不良分子，被安溪湖頭練總李維霖收買，乘農民軍度年關的時候，焚燬大部分軍糧。離帽頂不到一里，有一個地方叫做鵝山頭，地勢高過帽頂。晉江舉人陳鍾琦為清方叢策，先取船山頭，便可以進擊帽頂。清方採取這個策略，以咸豐四年（一八五四）三月初二日進兵，初九日早晨占領帽頂。^[5]林俊和所部二百餘人，已在半夜里從寨後離去了。寨上有糧只有數十石。林俊所以放棄帽頂，是因為糧食不繼。^[6]

當清軍攻帽頂的時候，農民軍並不示弱。有人拿“林萬青”的黃色名片，分向泉州各鄉宣傳；以烈王林三千歲的名義，在洪潮貼出告示。烈王是太平天國所給的封號。陳慶璣奏稿里，寫作忠烈王，然而太平天國并無兩字的王號。我懷疑是列王的訛傳。四月初十日卯刻，陳慶璣等率領農民軍，進攻泉州城的東北面，被清軍擊退，十六日寅刻又來；迫近城下的就有五六千；后面紛紛而來，四山皆是。清軍由東門而出，城外有地主武裝接應。農民軍陣亡了兩個首領——蘇胃、蘇玉。到了晚

[1] 涂慶潤：莆陽文輯，翁煥孫祭其星六（其八）別駕文

[2] 舌學編咸豐二年十月十二日東

[3] 清實錄卷一七

[4] 舌學編咸豐四年三月稟，及施經堂奏稿序陳懷齋（照）洋文節錄

[5, 6] 舌學編咸豐四年三月及四月二十日東